

倒退20年,人们经常会谈论“主流(大众)”流行乐,意思就是广受欢迎且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音乐。当你谈论“披头士”或迈克尔·杰克逊,实际上就是在谈论这个概念。不过,现在没人再提这两个概念了,只有在谈论音乐历史时,才会无法避免地提到它。导致流行音乐这段历史翻篇的原因有很多:

过去,你想成为一名歌手或音乐人,除了需具备一定天赋,你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你看看迈克尔·杰克逊,他一生都是在舞台上度过的;或者你看看R.E.M.这样的乐队,他们从只有几十个观众开始,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跻身一流巨星行列。但如今,人们可以不努力就成为音乐人,你只要稍微掌握一点技术,就可以学会作曲、编曲,甚至借助AI写歌词;你也不需要天生具备嗓音条件,音乐软件完全可以修饰你的声音缺陷。不过这类音乐人/歌手注定不会受到欢迎。

互联网扼杀了流行乐,让音乐

都柏林没有下雪。至少在我抵达的那个午后,天空没有一点儿要下雪的意思。想来也是唐突了,才刚九月,秋意正在兴头上,雪,根本是一场违背季候的胡思乱想。

天灰得像一页旧宣纸,街上乔治风格的建筑泛着潮色的砖红,利菲河沉静得有些忧郁,一只鸥从水面上掠过,波澜不惊的画面令我感觉有些漠然。即便不下雪,这座城也陷落在詹姆斯·乔伊

小文章里的格调与情怀

赵竺安

刊登在8月19日《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一篇陈平原所撰的《公共厕所如何标识》一文让很多读者看后心有同感,最近,笔者发现关于“公共厕所如何标识”的讨论也引起了新华社、央视等央媒的重视,新华网的一篇《我只想上个厕所,别考我了行不行》再度引发讨论。笔者曾经在一家饭店寻找厕所,看到门口挂着文化气息极浓的两块牌子“弄璋”“弄瓦”,这到底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慌不择路之下,请来服务员,才终于分清;回家翻词典,才知道这男女之别竟然来自《诗经·小雅》。为彰显文化、品位……把个简单的男厕、女厕搞得莫名其妙的,绝不止于北大大学教授陈平原所举凡例,如果随便在路边找个老百姓问一问,恐怕都有“尿急不敢撒”的尴尬。很显然,这是个被新媒体时代所忽视的社会民生问题,陈教授以他的平民视角观察到了,并著文在夜光杯上刊发。

在我看来,夜光杯一直发掘刊登这样贴近民生的小杂文小评论,绝不是灵光一现,是传承和发扬。《新民晚报》自复刊以来,恰似春燕飞入百姓家这句话,是广告也是宗旨,更是一代代晚报人的立身之本。历史上,《新民晚报》上受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文章,无不贴近“菜篮子”“痰盂罐”这样的城市生活。这类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的“晚报体”文章,是我们平头百姓最喜欢读的。办报人追求的“格调是高的,身段却是低的”,是老百姓的姿态。

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老师,以文学的笔触,随笔的调性,犀利的语言,将傻傻分不清男女的厕所标识的民生事,剖析得淋漓尽致,从中也看到了大教授的百姓情怀,他也以民生春燕的姿态,通过《新民晚报》飞入了千千万万百姓家。



流行乐已翻篇

王小峰

越来越分众。表面上看,这对独立音乐人或超级明星都是公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对整个音乐行业的伤害。

过去主导音乐潮流的是唱片公司和媒体,如今,唱片公司只能挖掘版权的价值,企划营销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的环境。这也是最近20年没有再出现一股新的音乐潮流、风格的原因。而音乐媒体实际上在十年前就“消失”了,自从社交媒体出现,音乐话语权已经不再属于音乐媒体,尤其是当唱片载体消失,人们无法用一个“音乐单位”来评价音乐。音乐过剩?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现在,那些经过时间磨砺流传下来的经典音乐实在太多了,我们一生可能都听不完,谁还会去听那些用机器制作出来的声音呢?音乐行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很大一块来

都柏林没有下雪

云想霓裳

斯笔下的清冷里——“大雪将至,一种怎么活都没有意义的无力感,长久笼罩在都柏林的城市上空,男女老少几乎无人幸免……”百年前,《死者》结尾处的那场雪是笼罩一切的象征,死亡、赦免、宿命与沉睡……乔伊斯让它落在整个爱尔兰,也落在每

一个良善灵魂的边缘。我是个一觉醒来的阅读者,在梦中习得了对生活温柔的悲悯,将文字的精魂化作旅行日常的呼吸。

时间刚好。如若早几年,我还太懵懂;如若晚几



1999年的上海音乐厅,在第18届“上海之春”的舞台上,当我演奏完二胡协奏曲《丽歌行》的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联的重要文化品牌活动之一,那时的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能登上这个无数人向往的音乐殿堂让我颇感自豪。2001年的上海大剧院,第1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演出中,我与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著名作曲家杨立青先生创作的二胡与交响乐《引子、吟唱与快板》。2002年的艺海剧院,第2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我因首演著名作曲家金复载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春江花月夜》民族管弦乐协奏版,而获得了“上海之春”优秀表演奖。“上海之春”给予我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对新人勇攀高峰的期许,有对民族乐器在当代绽放新声的厚望,更有对艺术传承者接过接力棒的嘱托。

此后,“上海之春”的舞台始终以包容与开拓的姿态,为我提

供了突破自我的艺术土壤、扎根实践的文化积淀和呼应时代的精神力量。2004年,我在民乐与合唱《二泉映月》的演奏中,探索传统乐器与多声部人声相结合的新表达;2008年,“外国作曲家写中国”音乐会上,我与笛子演奏家合作,演绎了双协奏曲《中国蝴蝶》;2009年,“加拿大作曲家写中国”音乐会中,我担任《在东方明珠的照耀下》《绿茶·地震与顽强不息》两部作品的二胡独奏,西方作曲家与民族乐器的碰撞打破了文化的边界;2010年“璀璨台湾”主题音乐会上,我与台湾国乐团合作演奏二胡协奏曲《燕子》,悠扬的旋律如同跨越海峡的信使,传递着促进两岸文化交融、守护和平统一的深层愿景;2015年“天弦情梦——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纪念活动”中,我和上海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流波曲》《人静安心》,承载着民族记

自那些过去人们喜欢音乐的时代创作出来的作品。现在,随便一支解散多年的乐队,复出后巡回演出,上座率都是满的,只是他们上了年纪力不从心,不然他们依旧横扫乐坛。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数字技术不像今天这样飞速更新,则还能给音乐人留出创作空间,我们依然能看到像麦当娜、“老鹰”这样的巨星出现。只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把人们创作想象力的空间瞬间挤压没了,互联网的时时互动反而让音乐与受众的距离变得更远。

流行文化是一种互相影响叠加的结果,过去流行音乐或者说主流音乐是全球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如今,流行文化已经分化成各种碎片,这些碎片跟音乐之间已经越来越无关,因此,音乐也不再是一种很酷的文化,也不具有吸引力。

所以,流行乐翻篇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当我们去听一首多年前红遍全球的歌曲,会有一种去博物馆听编钟声音的感觉。

年,我怕已麻木。此刻的都柏林就在这里,如同一场必须兑现的执念。

圣三一学院的长厅是都柏林一条庄严肃穆的时光隧道。踩着橡木地板走向那枚硕大吸睛的地球仪前,两侧的木质书架高耸入顶,老纸和松脂混杂着气味,文学与科学悬浮于四周。时空在这里是被折叠过的,错觉挣脱出三维,异象丛生。乔伊斯笔下的阴影仍在,贝克特的孤独仍在,叶芝诗意仍在,王尔德的尖刺仍在……爱尔兰文学脉动到今天,是萨利鲁尼写就的数字孤岛上,青年男女们一段段疏离的爱情。谷歌来了,亚马逊来了,苹果来了,微软来了,今天的爱尔兰俨然已是欧洲的硅谷,经济的富庶修复了曾经破碎的尊严,却不能抹去横跨了百年精神叙事的文学底色:当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文明在冷与灰之间,继续拥有着力人性。

白天的都柏林好安静,夜晚,则多了风情。街灯照亮的半便士桥上,行人影影绰绰。桥下的河水缓缓流淌,倒映出梧桐、酒馆与旧旅舍的光。街头艺人的琴声带着倦意的轻快,人们喜爱相聚倾谈,在路灯下,在河岸边,在酒馆

英国著名出版人、布克文学奖创办者汤姆·麦奇勒年轻时曾在一家叫“麦吉本与基”的“小型”出版社工作过。该出版社老板霍华德·塞缪尔,既是地产大亨,又是涉政的社会主义者,还拥有一份发行量很高的报纸《论坛报》——一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那么一个社会大亨何故要开一家小小的出版社?“那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对书籍的热爱。”汤姆·麦奇勒说。他还说霍华德·塞缪尔尽管风光、富有,可是真正能带给他内心的安稳和满足的正是这个麦吉本与基出版社。

汤姆·麦奇勒在“麦吉本与基”工作了两年,跳槽到了企鹅出版社时,有一天听到消息,前老板霍华德·塞缪尔失踪了,自此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霍华德·塞缪尔的离奇消失,和弗朗索瓦·欧容导演、夏洛特·兰普林主演的《沙之下》几乎一模一样,电影里是一对结婚二十五年的学者夫妇,自驾去海边别墅度假,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去海边游泳,在无人的海滩上,丈夫为妻子涂抹防晒霜、按摩,随后后者渐渐睡去。等她醒来,丈夫不见了……霍华德·塞缪尔也是这样,他和家人一起去度假,在家人不注意的时候,他也在海滩消失了。

夏洛特·兰普林饰演的玛丽,是一所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一天她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海浪》——那时玛丽的丈夫已消失了一年了——涌出一股股无法抑制的悲伤:我失去了青春……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发疯了,我听到了声音,我无法集中思想工作。我尝试着与之斗争,但我无法再继

里,在树影间。

差点儿被一杯咖啡放醉。地道的爱尔兰咖啡里,威士忌的参与度原来很高。微醺的我沿着利菲河走向驻地,一路交通灯的舒缓节奏仿佛穿越到了香港,两岸建筑物的霓虹灯又恍惚间梦回了黄浦江。“一切都平庸不堪,一切都令人失望”的都柏林被封印在不朽的文学作品里,一座拥有底蕴的城市如眼前这般:离沧桑很远,离安稳很近。只是这世间,又何止一个都柏林: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地凝视后,愿他们终将炼化自身的笃定。

我来到的都柏林没有下雪,它的雪,都幸运地落在了乔伊斯的书页——那个文明尚未冷却的梦里。



续斗争下去。你给了我所有的幸福。你是如此完美,但我不能再打扰你的生活了。这段《海浪》里的文字像是现实里吉尼亚·伍尔夫留给她丈夫的遗书。

后来,玛丽遇到了追求者文森特。有一天玛丽穿上一条酒红色的晚礼服平躺在床上。忽然间,她的身体有了强烈的爱欲涌动,而此刻,在幻觉中丈夫和文森特同时出现了,两双饱经风霜的成熟男人的手——左右分工——脱掉玛丽的鞋子,而后由下至上一寸寸地无限温柔地爱抚着。就像一曲交响乐渐渐临近高潮,接下去玛丽自己的手也参与其中……而六只手齐聚集在玛丽脸上——惊人的壮观、迷人的和谐!当年电影上映时,法国《自由报》的评论文章写道:夏洛特·兰普林的面容令弗朗索瓦·欧容的电影熠熠生辉!

电影接近尾声。玛丽接到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海边找到一具已经腐烂、不好辨认的男尸,但游泳裤和手表与她事先做笔录时描述的特征相符。她鼓起勇气去认尸……但当她看到手表时,却莫名其妙地大笑了出来,矢口否认那不是她丈夫的手表。这笑声很不自然且难堪、无可奈何,像是某种脆弱的掩饰,又像是对荒谬现实的发泄。而后她哭泣着走去海滩,双手疯狂地一次又一次伸入沙之下,仿佛要挖掘出什么秘密……而后她站了起来,面对空空荡荡的海滩。突然——我们(影迷)的幻觉?——有个酷肖他丈夫的男人在不远处伫立,玛丽跟踪踉跄奔跑过去,她奔跑的线路摇晃不已,像是一连串迷失的旋律。

忆翻译家马振骋

刘明辉

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上海图书馆贵宾室内其乐融融,手稿馆周德明馆长把捐赠证书放到翻译家马振骋手中,郑重承诺:上海图书馆一定服务好捐赠者,妥善利用好珍贵的手稿,为学界研究提供帮助。其实马老在前一年已经开始捐赠译稿,面对我们的邀请,他总是客气地说,不用费心办仪式,重要的是交给你们保存,其他都不要紧。马老就是这么一位务实的长者,说话实实在在,处事讲求实效。言必行,行必果。十年间,他无数次将自己陆续整理出的译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每次都是我到他府上去接收。马老将完整的译稿一部一部地移交给图书馆,每一份都反映了真实的翻译过程,没有一件是抄稿。他的字写得舒展,落笔时毫不犹豫,修改时十分果断,每个修改符号都非常规范,就像他的为人,坦坦荡荡,温和而坚定。后来慢慢感觉到,他的移交有自己的节奏和计划,这也让我在心中生出隐隐的伤感。2022年3月4日,马老捐赠了自己的法语学习笔记。他说,我捐得差不多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身拿出一本《小王子》给我,上面已经写好了字:“2021年4月15日,2022年3月1日才交给本人。”他笑说,知道你们在筹建新馆很忙,没想到一眨眼就隔了那么久。我们见一次变得不容易了。以为3月1日总能见了,没想到又延了几日。我说,马老师,您

的译稿,翻译研究者们非常珍视,东馆开放后,也会向公众展示您的译稿、学习笔记,希望读者能学习您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他看着我,郑重地说:“我学得确实很认真,将来一定要去看看上图东馆。”这是马老的最后一次捐赠。

马老师的老伴宋老师长马老两岁,和蔼可亲。我上门接收手稿,她就待在隔壁房间里,从不参与谈话。到了告辞之时,她一定会笑着送我出门,并再三感谢。马老的客厅和书房,许多文化界的朋友都很熟悉,从屋里眺望窗外,视野开阔,大桌上除了马老用来翻译的书写台之外,就是可口的巧克力和饼干。宋老师整理得整整齐齐,便于马老随手取用。如今马老师已经远行,但见字如面,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在东馆见到您的手稿,在手稿中认识您,怀念您。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我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十日谈

团结创造新征程

责编:刘芳